

甘肃文史资料选辑

第三辑

(修订重印)

50.6

3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6152/30
K250.6

34

2:3

甘肃文史资料选辑

第三辑

(修订重印)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委员会
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B 437809
一九八七年 兰州

修订重印责任编辑 孟国芳

甘肃文史资料选辑

第三辑

(修订重印)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委员会
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兰州第一新村51号)

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平凉地区印刷厂印刷

开本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5.875 字数136,000

1963年10月第1版

1987年9月第2版 1987年9月第2次印刷

印数: 2,431—5,292

书号: 11096·2 定价: 1.00元

ISBN 7-226-00121-7/K·17

修订重印说明

修订重印的《甘肃文史资料选辑》第三辑保留了原版本的所有篇章，对部分存疑的史实进行了核对，在文字方面作了进一步的处理，凡尚健在的作者，均征询了意见，并编入补充订正七则。

张乃恭《雷马事变中之马文车》一文，在马鸿宾史料专辑（《甘肃文史资料选辑》第二十一辑）中曾选用。特此说明。

一九八七年五月

目 录

朱绍良在西北.....	拜襄华 张鹤鸣(1)
我所知道的国民党甘肃省党部的活动情况.....	石 琳(21)
抗战期间国民党甘肃省党部活动的回忆.....	苏耀江(51)
三民主义青年团在甘肃的始末.....	张开选(66)
民社党在兰州.....	秦崇模(85)
李镜清被刺记闻.....	马培清(89)
关于李镜清之死.....	马廷秀(93)
陕军截夺陆洪涛军火记实.....	邢邦彦(99)
李长清、包玉祥之死.....	魏绍武(103)
雷马事件中之马文车.....	张乃恭(107)
黄得贵在固原的军事活动及其被杀经过.....	夏叙九(114)
甘宁青三省合拒孙殿英战事的回忆.....	马全良(119)
一九三二年兰州中上七校教职员索薪运动.....	龙右天 牛海秋(124)
解放前夕兰州市各院校学生反对“建设公债”的 斗争.....	郭维屏(131)
郭寄峤利用“甘肃省军公教合作社”名义敛财内幕	贺笑尘(140)
兰州淳化阁帖石刻遗存记实.....	赴元贞(144)
陇上旧剧琐忆.....	水 梓(146)
从甘肃实例看反动统治时期的	

田粮制度·····	潘锡元(152)
解放前甘肃的皮筏运输业·····	王信臣(163)

补充与订正

关于《雷马事件中之马文车》一文的订正·····	李世军(173)
对石琳所写《我所知道的国民党甘肃省党部的活动情况》 一文及龙右天、牛海秋所写《一九三二年兰动中上七 校教职员索薪运动》一文的一点补充·····	杨作荣(174)
对张鹤鸣、拜襄华所写《朱绍良在西北》一文的订 正·····	张逢南(177)
对王信臣《解放前甘肃的皮筏运输业》一文的订正 ·····	倪政祥(179)
对贺笑尘所写《郭寄峤利用甘肃军公教合作社名义 敛财内幕》一文的意见·····	李剑夫(179)
对石琳《我所知道的国民党甘肃省党部的活动情况》 的补充·····	苏芝畅(180)
关于李镜清被刺经过的补充与订正·····	赵颂尧(181)

朱 绍 良 在 西 北

拜襄华 张鹤鸣

一 朱绍良任甘肃主席时的地方情况和一般措施

一九三三年春，蒋介石在南昌决定：令杨虎城专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，调甘肃省府主席邵力子接任杨虎城兼任的陕西省政府主席；另调朱绍良接替甘肃省府主席。朱绍良时任第六路总指挥，以甘肃地处边陲，民族复杂，地方秩序混乱，顾虑政令推行困难，一再恳辞。蒋介石以一时无适当人选，坚令前往。朱乃当面请求：暂准他到甘肃试办三个月，如果做不通时，望把他仍行调回。经蒋介石答应后，朱遂于是年五月到兰接任。同年十月，蒋又在兰州成立了驻甘绥靖公署，命朱绍良为该署主任，仍兼甘肃省府主席。

朱绍良一到任，即调来胡宗南第一师的第五团杨德亮部，和另一宪兵营驻扎兰州。当时甘肃情况，确属复杂，民族的问题和浓厚的封建势力，到处存在；地方军阀把持地方行政，各据一方。马步青的骑兵暂编第二师驻武威一带，马步芳的三〇〇旅韩起功部驻张掖一带；二九八旅马步康部驻酒泉一带；邓宝珊的新十旅李贵清部、新十一旅石英秀部驻定西、静宁一带；马锡武的东路交通司令部所属的一个团驻华家岭、界石铺一带；鲁大昌的新十四师驻岷

县渭源一带；杨渠统的陇东绥靖司令部所属部队，驻陇东各县。这些部队的饷项来源，主要靠就地拨款，当时在甘肃全省七十余县、局中，凡是地方军队所驻的县分，县长和地方行政人员，多半是由驻军保荐的。地丁、钱粮，任意附加，临时派款，亦所在多有。土匪乘机横行，商旅裹足，人民生活，十分痛苦。

朱绍良主甘以后，为了进一步树立国民党中央的威信，表现他不负主子的恩遇，首先，以统一甘肃的军政为务。他的办法是：一、极力和地方士绅拉拢，建立私人关系，以取得他们的协助；二、对地方军队，则采取联络头领，建立私人感情的办法，以取得拥护；三、进一步和地方军队首领，分别协商，各县县长由省政府委派，钱粮税款，须按省政府统一规定，不得任意附加，收到的款须一律解交财政厅。关于地方军队所需军费，由省政府统一拨发；四、地方各军的编制和粮饷，应分别报请国民党民中央军政部核定。这样以来，甘肃的割据局面，便在表面上统一起来了，政令能下达了，治安也较好转了，但人民痛苦并未减轻。

那时甘肃各地，还公开种植鸦片，吸食极为普遍。不但地方官僚，吞云吐雾，即一般商业行栈，都烟具齐全，成为应酬往来客商的必需品。不少肩夫脚户，每到旅店打尖或夜晚住宿，亦以吸食鸦片为常。每到日落西山，兰州城中心的城隍庙（今工人俱乐部）内，就可看到三三两两，横陈竖卧在屋角檐下的人，公开吸食鸦片。其他如娼寮妓院，更以鸦片为招待客人的主要品。大街小巷，随处可见门口悬挂着“清水净烟”四字灯笼的烟馆。最令人奇怪的是当时城内学院街（武都路）还有一个“甘肃省禁烟善后局”，该局有总办、会办等负责人，都系政府简派的，下面还有不少工作人员，在外县还有分支机构，实际却是对吸食、贩鸦片者征收所谓“禁烟善后捐”的税收单位。据说当时甘肃省的财政收入“烟亩罚款”和

“禁烟善后捐”要占半数以上。因此朱绍良到甘后，这个单位还存在着很长一个时期才结束，而代之以“甘肃省禁烟委员会”（起先在左公祠，后在五泉图书馆）这个组织也相当庞大，有常务委员三人，秘书、科长等工作人员也有一大堆，但仅作了些“戒烟”方面的工作，如设立戒烟所、训练戒烟人员和制发戒烟药片等，这都是些消极措施，所以收效不大；对私商勾结军队贩运鸦片及陇南山区的私种罂粟，却一直没有根绝；即朱绍良的老婆华德芬，也一直是兰州的“头号瘾客”。

二 生活和用人

朱绍良从来自命不凡，以“宁静致远，淡泊明志”自许，并推崇黄老之学，表示与人无争。事实上这都是骗人的把戏。他自己知道争不过胡宗南，所以对胡就采取了隐忍退让的态度。正因为他能与胡宗南不争，才能在西北先后稳坐了十二年。朱绍良自己虽标榜清高，不额外需索，但他和他的老婆孩子，生活都十分考究。他自己，烟非加力克不吸，酒非白兰地不饮，他老婆华德芬鸦片嗜好极深，且非云南土不过瘾。至于他的五个女儿更因过度放纵，淫逸骄奢，声名狼藉。因此他就不能不有意识地放任其老婆大开后门，巧取豪夺。华德芬大量收受贿赂，放高利贷和公开走私，都是当时兰州人所共知的事。在解放前轰动兰州的一件大贪污案中，被枪决的八战区兵站总监班淦，便是因为给华德芬敛财而被牺牲的一个例子。朱绍良主要依赖内助为其聚敛，以供挥霍，因此他对老婆颇为恭顺，当时兰州官场有“朱绍良怕老婆”的说法。

谈到朱绍良的用人，由于他自己自负“才高”，对军事政治都有一套，认为不容易找到比自己更为高明的人，同时还认为部下有

才，难以驾驭，所以他主张“用奴才，不用人才”。不问才学如何，只要对他“忠诚老实”，就为合格。他还有一个毛病，凡是找他求工作的人，他总要表示慎重，各方考核，迟迟不予安置。因此，当时大家给他一个绰号叫“朱半年”。他还经常讲所谓“气节”，对蒋介石抱“士为知己死”的忠忱，从而也要求部下都对他忠诚。他初来甘时，以李勉堂为省政府秘书长，李勉堂系他陆军小学和中学时代的同学，他不得志赋闲时，李曾给他以经济援助，以后李又介绍他到陈铭枢的十一军当过参谋长，他们两人认识很早，交谊甚笃，所以对李是比较客气的。驻甘绥靖公署成立，又以李为绥靖公署参谋长兼省政府秘书长。一九三四年九月，李因赴飞机场送客，在返城途中，复车殒命。遂又以翁燕翼为省政府秘书长，章亮琛为绥靖公署参谋长。翁系福建举人，最善迎合朱意，唯唯诺诺，曲意顺从。惟贪财好货，在翁两任甘肃省府秘书长任内，苞苴公行，都装入翁的私囊。章亮琛曾任第六路总指挥部参谋处长，平庸无才，遇事马马虎虎，得过且过。章唯一的长处，是能绝对听朱的话，所以很合他的胃口。朱绍良第二次任甘肃省府主席时，虽曾一度以丁宜中为秘书长，但不久丁被特务密报，以其爱人王德谦有“共产嫌疑”，为蒋介石勒令离职。丁离职后，仍以翁燕翼为秘书长。一九三八年第八战区长官部成立，朱蝉联长官职位，仍以章亮琛为参谋长。一九四一年，蒋介石在重庆召集军事会议，朱绍良带同章亮琛前往参加。章身体肥胖，且素来精神萎靡，正当开会的时候睡着了，一时鼾声大作，引起了会场上的注意。蒋介石正主持会场，极为震怒，故意问章：“在五原战役中傅作义的步兵和门炳岳的骑兵是怎样配合作战的？”章瞠目不知所答。会后朱、章回兰，接到据说是蒋介石亲拟的电报，其中有这样两句话：“……这样的人如何能作参谋长？闻兄专好用‘拉污’之人……”。朱绍良于不得

已之下，把章亮聚免职。调第八战区兵站总监张鉴桂继任参谋长，张曾任第三军的参谋长，对朱的性格十分熟悉，当然他们是很能合拍的。

朱绍良用人好用奴才，他对部下也是封建主对奴才的态度，稍不如意，他就毫不客气，甚至拳脚交加。象上面说的班淦，本是他老婆华德芬的招财童子，对他当然奉命唯谨，但也常常难以避免他的“耳光”，于此也可证明朱绍良的“宁静”也不过是一派伪装罢了。

三 策划解决孙殿英和阻击红军北上

蒋介石对所谓杂牌军队，自来采取“以毒攻毒”的手法，于利用后设法消灭。孙殿英当时盘据山西边境，拥有五六万之众，在地方筹粮要饷，一味自由行动，引起了蒋介石的不安。一九三三年由北平军分会（何应钦主持）发表孙殿英为青海柴达木屯垦督办，令孙率部西开；而南京的蒋介石同时又密令朱绍良在西北沿途截击，务将孙部消灭。孙殿英也看透了蒋介石的这个阴谋，但他却自恃兵力雄厚，将计就计，要乘机先占取宁夏。他以先头部队丁綽庭师向宁夏假道，以夺取宁夏省城，又以芦丰年、刘月亭等师进占宁夏各重要据点，企图席卷宁夏全境。当时宁夏主席为马鸿逵，对孙殿英的狼子野心，亦早有准备，集结了全省兵力，以作背城借一之计。

朱绍良于接到蒋介石电令后，即在兰州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，部署截击孙殿英的军事。青海省政府主席马麟、三十五师师长马鸿宾和驻在甘肃的各军事将领都参加了会议。朱绍良即席提出援助宁夏问题。他说：“孙军西来，宁夏省城有被包围危险，倘马鸿逵抵

抗不住，使宁夏为孙所占领，继续向甘青前进，则西北全区均受威胁，我们必须不分畛域援助宁夏。”马麟、马鸿宾等都一致表示愿出兵援助马鸿逵，共同击溃孙殿英。会后，马鸿宾的部队，首先由金积、中卫等地出动，驰赴银川增援；马麟也派兵两旅，开赴宁夏；朱绍良又令第一师胡宗南部的旅长袁朴率领第四团罗历戎部、第五团杨德亮部、骑兵团蔡仲部，开赴宁夏支援马鸿逵。

孙殿英的丁綍庭师围攻宁夏省城两个多月，未能攻下。因各增援部队开到，丁师腹背受敌，退逃无路，就投降马鸿逵。孙殿英的其他部队如刘月亭、芦丰年、于世铭等分别接洽投诚，经军事委员会分别改编刘、芦、于等部为独立旅，直辖于国民党中央。孙部吕存义旅开到兰州后，由胡宗南的第一师改编了，李纯华旅被交械编并。孙殿英见大势已去，偷偷地逃走无踪。至其后方械弹辎重，都为阎锡山所接收。朱绍良完成了消灭孙殿英的任务。

一九三五年，朱绍良为了堵截红军北上，指挥第三军军长王均率第七师曾万钟部驻天水、临洮一带，第十二师唐淮源部协助新十四师鲁大昌部驻甘南、岷县一带；三十七军毛炳文率第八师陶峙岳部，第二十四师李荫部驻陇西、定西一带；第二十五师关麟征部驻平凉、固原一带；第六师周岩部和胡宗南的第四、五两团驻兰州附近。一九三六年冬，王均由天水飞兰，中途飞机失事毙命。

当红军经过陇南及陇东地区时，并未发生大的战事，只有经过甘南地区时，新十四师鲁大昌的部队和十二师唐淮源的部队与红军有几次接触。红军经过陇东固原一带时，曾被关麟征的部队阻截，经过短时间战斗。惟徐向前将军率领的红军进入河西时，被骑五师马步青的部队及马步芳的韩起功、马步康两旅截击，战斗情况较为激烈，使红军受到相当损失，俘虏了红军几百人，送到兰州后，朱绍良挑选了其中的大部分青壮年，补充了他的特务营，其余老弱

分别遣散了。

四 专任绥靖主任和“双十二”事变前后

于学忠任河北省主席时，对驻在天津的日本驻屯军的借故挑衅、阴谋诬蔑等事件，对策强硬，使日军感到头痛，于是威胁蒋介石要求撤换于学忠。蒋介石深怕惹起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，竭力敷衍，乃商得于学忠同意，将他调西北接替朱绍良的甘肃省政府主席。朱绍良则专任驻甘绥靖公署主任。

朱绍良为蒋介石嫡系，于学忠出自东北军，由于系派不同，他们在甘肃分主军政，鸿沟很深。朱、于之间，很少私人往还，于访朱一次，朱始回拜一次，朱从未主动访过于。两人见面完全是一派客套，各存界限。于学忠的五十一军，本归绥靖公署指挥，但于学忠派到绥署的联络参谋，从未得到任何军事情报，五十一军参谋长刘忠干曾亲往绥署询问，而绥署参谋长章亮聚亦严守机密，一点也不告诉。因此于学忠和刘忠干都对章亮聚不满。当时驻兰州的中央部队经常和五十一军发生小冲突，双方均无法制止；马步芳和马步青驻在河西的部队，在朱绍良的支持下，把持各县行政，使于学忠的政令，在河西地区无法推行。因此于学忠的主席职权，一面受制于朱绍良，一面又割裂于马氏兄弟。

一九三六年十二月，蒋介石到了西安，召集军政首领会议，朱绍良、于学忠都奉召到达西安开会，不久即发生了“双十二”事变。据朱绍良自己说：他在西安住西京招待所，当“事变”发生的那晚，外边枪声乱响，并对着招待所一阵射击，他当时不明外边情况，只有躲开门窗，避在室内，不敢妄动。枪声停止后，有一个排长带着几个人进了他的住室，他当时心想：这可能是抓他的吧！

不料这位排长并没问他是什么人，头一句话是：“住的地方很阔，一定很有钱！”他才把心放下了，跟着答言说：“这是你们杨主任招待我们的。钱是有，我身边带的有限，只有一百八十元钞票，”说着就把钱掏出来，交给这位排长。朱绍良有一件獾绒皮大衣挂在衣架上，这位排长看见了说：“这件大衣很好”，朱也马上送给了。后又看见一个小皮箱，要打开看，朱立即给打开了，这位排长翻了一下，因为都是些衬衣之类的普通衣物，丢下走开了（这是朱绍良自己所说，不一定是实际情况）。朱绍良一直被软禁在西京招待所。另据他自己说，他在软禁期间，没有什么恐惧，惟警卫人员每到交班后，到各个住室查看，这曾使他一度意识到被暗暗处死的可怕。因为有天晚上，警卫接班时，变了方式，喊他们大家到室外集合，他以为是要把他们集体处死，感到死神将要降临的恐惧，一时思想上交织着阴森和酸痛。后来他又想，横竖是死，何必叫人另费周折呢？他就告诉警卫：“他们要收拾我，就打在这里，我是不出去的。”警卫笑了说：“我们为查点方便，才请你们到外边去，既然如此，不出去也就罢了。”最后张学良决定送蒋介石回南京时，才恢复了朱绍良的自由，与蒋、张同机到了洛阳。

兰州市在“双十二”事变发生了的那天晚上，约七点钟左右，水北门一带枪声乱响，绥靖公署的官兵们正在开饭，一时莫名其妙，不知发生什么事故，仅据报城内和四郊都布满了东北军的岗哨，戒备森严，城门也禁止行人出入。于是由副官处长拜伟（襄华）亲赴五十一军军部找其参谋长刘忠干，当拜伟到五十一军军部门口时，兵卫森严，且架设枪炮，如临大敌。及至见了刘忠干，拜伟就问：“有什么事，等两位头子（指朱绍良和于学忠）回来再说，闹出事来不好”。刘说：“这是非常之变，我们是响应西安的行动，我们已经晚了些，西安是昨晚午夜就发动的。”拜说：“既然如此，总

要以地方为重，不要发生骚扰，使地方糜烂。”刘又说：“两方面真要打起来，那也很难免了。”话后刘忠干叫拜不要走，怕出去发生危险，此时拜已意识到事变的严重性，乃向刘要求，暂住五十一军军部。

当晚东北军一部分攻进了绥靖公署。该署卫士曾进行抵抗，但寡不敌众，除死亡了几名外，全部缴械。存在绥署的物资亦被抢掠一空，章亮琛等绥署处长以上军官，均被拘留在下水巷六号东北军招待所内。只有军需处处长王式辉是晚在西城巷绥署参议杨继高家，被五十一军军部的某队长跟踪，连同杨继高一起被枪杀在杨家。东校场驻的胡宗南第一师的骑兵团，被攻击缴械，团长蔡仲也被打死；又收缴了省会警察局的全部武装，逮捕了警察局局长史铭和国民军训处处长胡维藩。

在张、杨释放蒋介石的前一天，甘肃省政府秘书长周从政，正准备在次日开公民审判大会，并要当场处决几个人，据说其中有史铭和胡维藩，到了当天得到释放蒋介石的消息后，认为西安事变已和平解决，遂停止开会。这天下午于学忠从西安返兰，马上释放了史铭和胡维藩，并把打死王式辉的某队长撤职了。

蒋介石回南京后，扣押了张学良，驻在西北的东北军，人心汹汹，蒋介石又把朱绍良派到陕西凤翔，集结驻甘的蒋军，积极部署攻击东北军的军事，直到七七事变后，朱绍良才离开了凤翔。

五 朱 谷 关 系

朱绍良和谷正伦于民国初年在贵州就是同事，朱绍良当时任王文华部的参谋长，谷正伦任王部旅长，意见就不融洽。一九四〇年十一月，谷正伦接任了朱绍良的甘肃省政府主席后，朱就专任第

八战区司令长官，他们在交接时，因私人利益矛盾，朱绍良的秘书长翁燕翼又在中间传话不实，曾引起双方很大的不快。谷不仅对朱绍良的政治作风和行政措施完全否定，他更露骨地以法西斯作风大张旗鼓地改弦更张。有一个时期双方矛盾愈来愈深，形成军政绝对分治、各行其是的局面。

朱绍良治甘的政治口号是：“安定中求进步”。他认为甘肃偏处西陲，地瘠民贫，军阀割据，汉回分歧，秩序混乱，他为实现统一，首先要求贯彻政令，他一面打着国民党中央的招牌，一面依仗着胡宗南的反动军队，对甘肃地方武装采用利诱势迫的手段，使其先后就范。对少数民族，故意制造内部分裂，以便掌握，又极力培养马步芳为镇压少数民族的工具，使少数民族处在高压下忍气吞声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甘肃局面暂时呈现统一和平的假象，朱绍良还自认为他的手段高明，不可一世。其实甘肃人民生活愈形贫困，落后情况有加未已。谷正伦认为朱绍良因循敷衍，没有魄力，所以他提出的政治口号是：“进步中求安定”，故意与朱标异。谷还为表示自己求进步干劲大，在朱任内所派的县长中，凡是为朱绍良所亲信的都撤换了，并且还枪毙了陇西县长黄圻，一时雷厉风行，表面上看起来谷不瞻徇情面，实际不过是有意给朱绍良以难堪而已。

一九四二年，谷正伦乘物价暴涨，法币贬值的时机，成立了甘肃省物价平衡委员会（下称平价会），把他的亲信余仲觐派为该会经济纠查队队长，对商人储存的货物，一律登记，不准私自出售。余仲觐挨户搜查，闹得商民惊心吊胆，人人自危。因为货物一经登记，即由平价会评定最低价格，由该会尽先提取，其他机关单位经平价会核准，仅能提取极少数货物。平价会把大批登记了的货物，集中送仓库储存起来。过了一个时间，由甘肃省政府和三民主义青年团组成了合作社，按最高价格零售出去，获得了巨额的非法利

润，谷、余和三青团的寇永吉等借此发了一笔“国难财”。由于平价会“评价”的关系，商人再不愿到沦陷区去办货了，一时后方物资大感缺乏，物价更加上涨，人民怨声载道，谷正伦只好取消了平价会。这是谷正伦自认他比朱绍良敢干、能干的一件“杰作”，但结果是他自己发财，而商民大遭其殃。

一九四二年甘南临洮、岷县等地灾荒严重，民不聊生，谷正伦又不顾人民死活，大施其残酷压榨的政策，尤以征购征实的任务最为严重。一般地方官吏乘机勒索，甘南人民实无法生活下去，迫不得已起来反抗。他们提出的口号是：“救灾抗粮”。到了一九四三年春天，灾民有十万余人，声势浩大，由甘南各地汹涌澎湃，发展到兰州附近，群情激昂，有进攻兰州之势。谷正伦慌了，他本来因与朱绍良政见不合，很少往来，此时不得已就赴城外邸家庄朱的私邸找朱面商办法。谷正伦向朱绍良说：“乱民势力很大，有进攻兰州之势，我为保卫兰州安全，拟加固兰州外城城垣”。朱绍良对谷一向的独断专行，极为不满，而且认为谷没有政治头脑，简直是胡闹，现在闹出事来了，才来找他，为了显示他比谷镇静而有办法，对谷说：“战区司令部驻在城外，如果战区驻在地保不住，城还能守吗？修城垣的事，太用不着了。”朱绍良还以虚伪的关心人民的态度，并表示自己宽大，继续说：“这是灾民不是土匪，我正在设法劝告他们回家，各安生业，我不忍使用大军进剿”。接着他又说出了实话：“万一劝告不听，那时再派大军进剿，很快就可以解决，你不要怕”。随后朱绍良果然采用了欺骗、麻醉手法，散发了劝告灾民书，还张贴了这类布告，这些东西本来起不了什么作用，只不过表现朱绍良的又一次欺骗罢了。

正在此时，兰州城内发现了许多标语，有：“打进兰州城，杀尽南方人”；“打倒谷正伦，拥护朱绍良”等词句，这显然是起义